

解放初期的煤矿工会工作

陈士林

门头沟的煤炭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几百年来京津地区人民生活用煤的主要供应基地，大小煤窑数百个，到门头沟解放前夕有职工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人，是北京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漫长的黑暗岁月中，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穿的是破麻袋，吃的是豆饼块，头上蓑衣盖，脚凉灶灰埋”这首歌谣是矿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原始的劳作环境，时时威胁和吞噬着工人的生命。“煤窑的饭拿命换”是广大矿工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有力控诉。自从矿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就领导着广大矿工为反压迫、反剥削、求生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矿工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和黑暗的旧社会搏斗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解放初，党领导工人建立工会组织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门头沟解放了，从此煤矿工人获得了新生，“煤黑子”站起来了，成了矿山的主人，大家欢欣鼓舞，额首称庆。

解放的当天，党就派来了城工干部和工会干部，组成了工会工作组。工作组首先带领工人们取缔了旧工会（资本家借以麻痹工人而培植的走狗组织），筹建工人自己的工会，并指派19名干部和13名党员、党的积极分子到中英矿、城子矿、中兴矿、西山矿、宏顺和四维等六矿，以及门头沟、城子、大峪沟三片的小窑建立了八个工会筹备委员会，在职工群众中酝酿组织正式工会。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建立了由11名委员组成的门头沟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各单位也相继通过临时职工代表选出了分会筹委会，并受总会领导。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同年四月召开了由153名临时职工代表参加的临时职工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门头沟总工会，毛树多任工会主席，于文新和李长顺任副主席。总工会下设组织、宣传、劳资三个部和秘书处，专职工会干部20人，各矿也先后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为了把职工更快、更好地组织起来，各级工会组织首先开展了宣传、讲解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入会的意义，然后按照总工会制定的“六项”入会条件，本着自愿的原则，先后把绝大多数职工吸收为工会会员，从而奠定了工会工作牢固的群众基础。

通过各级工会组织两年多的积极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召开了有92名工会会员代表参加的京西矿区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解放后两年来的工会工作，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选出了由27名委员和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同时选出了经费审查委员会，陈士林任主席，于树多、刘子信为副主席，设常委15人。在职工代表大会前后，各基层工会和工会小组也相继成立，有76个基层工会组织，1080个工会小组，积极分子2800人，至此，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诞生了。它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真正的

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自己的组织。

推翻包工柜和把头制

一九五〇年初，工会领导矿工进行了推翻长期剥削工人的包工柜制和把头制的斗争。

包工柜和把头制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剥削工人的产物，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黑暗的包工柜制度，继资本家之后层层盘剥着工人的血汗，并通过“查头”、“大头”、“二头”对工人进行劳动监督，动辄就对工人进行打骂。把头是矿主资本家的走狗和帮凶，他们不但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还利用各种方法吸吮着工人的血和肉，克扣工人的工资、吃黑工等。大把头张振凯用工人的钱为自己刻制金图章，为其母立碑勒石，为了更多地从工人身上捞取钱财，他不但在五个包工柜入股，自己还开了五家五金店、三家商店和数座小窑。广大工人早就对包工柜和把头制深恶痛绝，推翻包工柜和把头制是广大矿工的迫切要求。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首先以各种形式开展了推翻包工柜和把头制的宣传教育，使大家认清了包工柜的性质及把头对工人的种种压迫和剥削，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主人翁意识。在此基础上，首先在门头沟煤矿二号柜进行试点推翻包工柜，组建了由工人当家作主的生产组，从而使二号柜的工人摆脱了包工柜制度的压迫，生产情绪大为高涨，煤炭产量大有提高。随着产量的增长和中间剥削的消除，工人的工资收入也明显提高，这一事实，有力地启发了其它柜上的工人，也都提出了“取消包工柜，打倒包工柜”的口号。经过工会进一步的发动，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推翻包工柜，到四月初，全矿23个包工柜全部被推翻，普遍建立了生产组，从此工人掌握了劳动生产的领导权。搬掉了这长期压在工人头上的顽石，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四月十七日全矿产煤一千四百六十四吨，创造了3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煤矿的生产秩序得到了加强。在门头沟煤矿的影响和成功经验的推动下，其它各矿工人也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推翻了所有的包工柜，工人真正成了矿山的主人。

一九五〇年五月，工会为贯彻燃料工业部关于废除把头制的“通令”，根据矿工的强烈要求，组织和发动全体职工开展了反把头的斗争。中共门头沟矿委、京西煤矿公司、北京市煤矿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把头制和把头作风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团结全体职工发展生产”的反把头斗争方针。为了加强领导，公司、各矿都建立了反把头工作委员会，由党政工的主要领导组成，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宣传活动，召开座谈会，揭露把头欺压工人的罪行，提高大家的觉悟和参加运动的自觉性，各单位多次召开职工代表会议、职工大会，教育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作为运动的骨干。在作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于五月十九日召开了由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法院、公安、矿务处和公司党政主要领导及工人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训诫大会，对各矿把头进行了训诫和处理。大会由公司主要领导讲话，揭露封建把头制的实质和罪恶，阐述党的政策，宣布撤消大把头张振凯等16名把头的行政职务以及他们必须遵守的五条纪律。会上，三名工人代表愤怒控诉了张振凯等把头的种种罪恶，煤矿工会主席代表市煤矿工会向政府提出控诉，请求政府依法严惩封建把头张振凯，政府领导当即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当场将张振凯逮捕法办。

大会结束后,各矿工人看到有政府撑腰,一些以前有顾虑的职工也发动起来了,各矿多次召开控诉大会,一连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痛哭失声地倾诉自己的苦水。通过诉苦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对旧社会、旧制度和把头制的无比仇恨,深刻体会到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提高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一般采煤0.4吨/工,最高的达到0.8吨/工。

实行民主管理,促进生产发展

门头沟解放后,长期受压抑的煤矿工人就好像从黑暗的窑洞中刚刚爬出见到阳光一样,深深地呼吸着新社会的新鲜空气。过去的岁月,地上地下一样黑,矿工是奴隶,而如今,矿工成了矿山的主人,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恩泽,体会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他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在这过程中,各部门协同作战,在刚刚解放到处是一片乱摊子的情况下,很快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开展了争当英雄模范人物,开展劳动竞赛的活动,大大促进了煤炭生产。在党、政、工会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煤炭生产任务,为缓解京津地区解放初煤炭供应紧张的情况作出了贡献。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使煤矿生产尽快得到恢复,首要的任务是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各单位根据上级的指示先后建立了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管委会由矿(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各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工人代表组成。这是解放初期党在矿区实施民主领导的组织形式。为了更好地实行管理民主化,在推翻包工制和把头制的基础上,矿区工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在国营、公营矿厂贯彻实行管理民主化的决议》,决议指出:“矿、厂中工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配合行政继续贯彻实行矿厂管理民主化,彻底肃清官僚和封建管理制度的残余,使矿厂真正成为人民的企业。健全‘管委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会议制度,‘管委会’所要讨论的生产计划、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人事工资福利……,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使所有重要决定都是集中群众意愿后作出的,‘管委会’必须定期向职工代表会议或职工大会报告工作,对群众建议中能采纳的要采取措施予以实现,不能采纳的要作出答复……”。这个决议,充分体现了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在工会的领导下就开展了爱国主义安全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广大职工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一方面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一方面展开了劳动竞赛,城子矿通过劳动竞赛,使过去日产煤289吨提高到日产600吨,门头沟煤矿机电工人做法兰盘由过去的35个提高到210个。据不完全统计,职工提出并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达310件,使煤矿的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召开的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安全生产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更进一步促进了竞赛活动的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这过程中,工人群众积极地为生产出谋划策,门矿的刘致和改造了引线机,一年可节约小米27万斤。到一九五二年,工会又组织开展了“爱国主义安全增产节约竞赛同推广先进经验相结合的劳动竞赛,实行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同奖励挂钩”。到年底又开展了“红旗竞赛”,参加的有1239个小组,9665人,通过竞赛,扭转了当时出勤率低的问题,使出勤率达到80%左右,找出窍门276个,合理化建议801件,采用先进经验3件,涌现出各级先进个人823人,先进集体29个。

工会在抓生产的同时抓了安全工作，针对当时工人中普遍存在的“下井三分灾，难免不死人”等忽视安全的麻痹思想，提出了“安全第一”的口号，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工会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安全卫生委员会，定期检查或抽查工作中的安全问题，提交有关部门解决。工会还组织各部门建立与安全有关的各项制度，举办训练班，下发安全手册组织学习，丰富安全知识，教育工人正规操作，把安全工作列为竞赛的重要内容，从而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经常性的群众思想工作，是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解放初期工会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集中地开展了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提高文化素质的工作。

由于解放前的黑暗统治，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致使大部分工人没有文化，有些人对解放后形势的变化抱有怀疑、观望的心理，同时，因不了解党的政策，存在模糊思想。个别坏人趁机捣乱，图谋不轨，所以，开展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成为实现“安定秩序，恢复生产”总方针的重要任务。工会用召开工人代表会、职工大会以及锅伙会等形式，首先向工人讲解目前形势、党的政策、重大时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工人阶级解放前后所处的不同地位等。总工会还于1949年1月举办了两期党员和积极分子72人参加的脱产训练班，每期5天。各分会也先后举办积极分子业余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有：和平阴谋、当前形势、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工商业政策、劳大决议、工会工作等。方法都是讲课与讨论相结合，不少人在讨论中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看到了光明，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在这期间，工会还会同有关部门几次召开全矿区的群众大会，由军管会和工会领导同志宣讲，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以上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对安定秩序，促进生产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工会还针对不同的对象，存在的各种问题，用多种形式开展思想工作。如：向工人们宣传和讲解工人同职员的关系；新民主主义企业同官僚资本企业的不同性质；工商业政策；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对解放初期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正确处理好各类关系；树立主人翁意识起了明显作用，并促使部分积极分子尽快地成熟起来，少数工人被提拔为干部，大量工人成为生产的骨干，有些被选为劳动模范，或被吸收入党。门头沟煤矿，为了更好地加强职工教育，矿工会与有关部门商量制定了有关制度，如每周召开一次工人代表会，十天一次职工大会。1951年先后还建起了一千多名职工参加的92个读报组，坚持每天读报、学习时事，从50年5月，开始历时两年半的时间，办“矿工小报”70期。这些活动，针对性很强，对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坚持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从1951年起，在一些较大单位配备了专职的政治教员，负责讲课并组织职工学习政治理论，1952年，这些单位系统地组织学习了《政治常识读本》。其它各小窑则通过有线广播转播北京电台每周四次的政治课，组织住锅伙的工人4600人按时收听，并推选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或工人进行辅导。

在1949年1月，工会在门头沟煤矿组织了职工业余识字班，参加者逐渐达600余人。1950年6月政务院发出《开展职工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后，工会又大力组织开展了普遍性

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加强领导，明确由党组织、工会和有关部门负责担任正副校长，工会下设教务处负责具体业务，各矿和私营工作委员会，也建立相应机构。利用旧房或新建了教室，购置了桌椅，聘请了专职教员，推选出大批不脱产的小先生。矿工业余文化教育到51年已有正式教师32人，学员6673人。在办学中逐步建立了点名、考勤、补课、考试、奖励等制度，使教育工作走上了制度化。

为了尽快在工人中扫除文盲，1952年6月在城子、机厂以及各小矿等单位组建了有189人参加的三个速成识字实验班，要求在90个小时内学会二千字以上，并能阅读通俗读物和写简单应用文。实验结果达到了预期目的。如小矿的40人由原来平均只识字255个，经过学习平均能识2156个字。在实验班的影响下，到十月份所有普通班学员共7035人全部转入速成识字班学习。一个月中就开了52个班，从而加速了扫盲工作的进程。到1952年，扫除文盲5443人，其中达到高小水平的1362人。

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扫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素质，从而为解放初期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关心职工生活，为职工办实事

关心职工生活，是工会主要工作之一，工会作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在当时条件允许下，关心群众疾苦，为职工办实事，也是工会的一项任务。在主动与行政协商并取得支持下，主要解决了十几个群众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行政按工资总额的20%提取劳动保护基金，作为职工病残伤亡领取待遇的经费；把职工在工伤后治疗期间的抚恤金增加一至三倍；组织工人伙食团，建立职工食堂，解决吃饭难问题；增加大小浴室七个，为工人洗澡；扩大医务室，增加医务人员，改善工人医疗条件，方便职工就医；扩大增加理发室，方便职工理发；统一了职工房租、烧煤津贴的标准；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享受同等待遇。对私营矿窑，经工会多次与资方交涉，也解决了劳资纠纷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

以上问题的解决，工人收入有增加，生活有明显改善。到1951年3月，先后执行了国家颁布的《劳保条例》。使职工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及家属都享有“劳保条例”中规定的各项照顾，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高兴地说：“毛主席关心工人，共产党真好，我们永远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五支队的战斗历程

文史办公室 整理

抗日战争初期，在平西革命抗日根据地活跃着一支较为强大的抗日游击队——国民抗日军，后被编为晋察冀五支队，我区有部分青年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又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团。因部队战士都佩戴有红、蓝相间的袖箍，斋堂川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支部队称为“红蓝箍”，但对它的整个革命活动和斗争历程很多人都缺乏系统的了解。现在，我们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再现五支队的发展以及它的革命斗争活动，以褒扬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一、“国民抗日军”的发展

晋察冀五支队的前身是“国民抗日军”，也有称其为西山游击队的。这支抗日武装成立于“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的热潮之时，发展壮大在硝烟烽火抗日斗争活动中，而最后归结在人民军队的行列。这支部队的主要成份是：有北平城里的大、中学生；城市里各种职业的市民及京郊农民；有冀东保安队反正过来的士兵；有国民党二十九军的零星部队；有从监狱解放出来的“犯人”；有东北义勇军流亡到北平的士兵和学生以及难民，部队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我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及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这支队伍不断地得到改造和发展。

早在“九·一八”后，张学良支持的救国会曾派一批青年如张希尧、苗可秀、纪平甜、高鹏等联络在满各地的义勇军，有个叫赵同的中学生随苗可秀去辽南，辽南义勇军失败后，赵以义勇军的名义组织有二十余人入关到处活动，后被国民党二十九军击溃。在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下又重新组织起了一支有五、六十人的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夜，这支游击队打进了德胜门外第二监狱，解放了狱中所有的犯人，其中有不少“政治犯”，这些人大部分加入了游击队。第二天召开大会，把游击队编成了三个总队，赵同的舅舅任福祥为一总队长，宋鸣皋为二总队长，刘凤梧为三总队长，并在各总队配属了政治干部，部队骤增至六、七百人，这次行动影响很大，震动了整个河北及北平城，北平警察局长潘毓桂及河北高等法院院长张允同的2564号布告称：“在北平河北第二监狱僻处北郊，距城稍远，前因时局紧张，溃兵流氓，附近四围，竟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持枪破扉，涌入监门，毁坏电话，威逼职员，劫掠枪支，打毁监房，放出犯人……。”充分显示了群众抗日斗争的无比威力。

由于队伍的扩大，部队成份比较复杂，不断出现违纪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为加强组织纪律增强战斗力，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全军在三星庄召开了大会，经大会通过组成了十三人的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领导机关的人选：司令员赵同；副司令员郑子风；参谋长包旭堂；政治部长高鹏；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汪之力。由军政委员会决定了总队、大队的领导人

选，宣布了部队的基本纪律和全军约法，并决定部队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并以红蓝两色绣有“国民抗日军”的旗帜作为军旗，全军发了红蓝袖箍，蓝色象征沦陷了的国土，红色象征战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红蓝箍”的由来。从此，一支抗日的革命武装活跃在平西的大地上，到处打击日寇，使敌人坐卧不宁。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部队在北平去温泉、阳坊、南口的交通要道——黑山扈地区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经过全军大会的整顿，部队士气高涨，给了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战斗中，在原二十九军任过副连长的苏家顺组织战士用机枪和步枪打下了敌人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清河镇上。此次战斗不但震动了北平城，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上也登载了黑山扈大捷的消息。同时，也使日寇的猖狂侵略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增强了抗战军民的信心。

初次与敌人正面作战的胜利锻炼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十月，日寇调动了万人兵力，配有飞机、坦克进行围剿，企图消灭这支抗日力量。部队在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后，进入妙峰山一线的西山地区，和宛平七、八区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魏国元、张又新等取得了联系，并由焦若愚、刘平代表部队在地下党员彭城同志的引导下和谭天元的代表、八区区长杨运棠等在军响谈判，达成协议，可进七、八区。以清水、斋堂、军响、青白口等地区作为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并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工作。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两千多人，光机枪就有四、五十挺。十月中旬，部队在斋堂召开了第二次全军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解除投机革命的副司令郑子风、参谋长包旭堂、一总队长任福祥等的职务、开除军籍的决定，再度宣布严整军纪。增选常戟武、王建中、沈海清为军政委员，常戟武任参谋长，对各大队、中队的干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王建中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去二总队仍由汪之力兼主任，部队组织更加纯洁和完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八路军为了坚持和开展敌后对敌斗争，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了团结各地方武装，扩大爱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八路军在频繁的对日作战中，对各地区的地方抗日武装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当时在平西地区组建了一分区，分区司令员由军区独立一师师长杨成武同志兼任，师政委邓华兼一分区政委。杨成武受八路军总部委托，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名义，给“国民抗日军”写了一封信，其主要内容是：一、向“国民抗日军”表示慰问；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况；三、如果他们愿意联合抗战表示欢迎。这封信，成了“国民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加入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列。

二、党对“国民抗日军”的领导

在“国民抗日军”成立之初，党就注意了对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并派出党的优秀儿女和进步学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所以在这支队伍几经重大考验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抗日的革命武装的特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赵同在组织游击队失败，正在穷途末路之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为了建立一支为党所掌握的抗日游击队，及时地派出共产党员汪之力、张如三、史进

前，以“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和东北救亡会代表的身份与赵同接触，并从城里输送一批党员及积极分子加入了这支游击队，其中有从东北军学兵队来的王建中、王远因、尚英、霍至德、王文、冷拙、包乾、金震中、霍炎、环宇、解方平、李望东等人。很快就使游击队扩大到五、六十人，其中党动员出来的青年占了半数。这样，就为这支抗日游击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解放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后，由于队伍的不断壮大，为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由汪之力起草了全军约法，正式成立了“国民抗日军”，并组建了以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各级领导机构，除汪之力、高鹏、纪亭榭等参加全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外，更多的党员及积极分子如：王文、张如三、于善甲、王达、金震中、冷拙、史进前、霍至德、王建中、阎铁、尚英、黄秋萍、贾嵩明等均出任大队干部，扩大了党在部队中的影响，此后，党又陆续派出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入部队，充实到各个总队，对于巩固这支抗日部队，防止赵同等一伙妄图搞独立的阴谋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如：一九三七年十月，为粉碎广寇的扫荡，指挥部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而副司令郑子风带着三总队不按命令向主力靠拢，反而主张东去，妄图分裂部队，遭到党员黄秋萍、戴昊、贾嵩明、尚英等的激烈反对，最后总队长刘凤梧在党员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按指挥部的命令行动，郑子风看自己的阴谋未能得逞，就离部队跑到城里去了。

部队转移到宛平的七、八区青白口、斋堂、清水等地时，首先和当地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进一步巩固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斋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军代表大会后，建立了中心队委，各总队及直属队分设四个队委。中心队委书记汪之力，下属四个队委分别由陈大凡、王建中、沈海清、王远因担任书记，同时，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为加强统一战线的领导，顾全大局，仍让赵同当司令，而实际整个部队完全处在党的领导之下，牢牢地把握着部队的政治方向。

当部队接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来信后，中心队委当即将信件在部队中公开传达，开展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广泛宣传以及有关共产党、八路军的历史教育。同时，排除赵同的干扰，使赵不得不同意派汪之力、韩庄、王远因三人为先遣团去和八路军杨成武部取得联系，从而开始使“国民抗日军”成为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八路军总部正式批准，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聂荣臻司令员在全军大会上宣布将“国民抗日军”编为晋察冀第五支队，任务是负责建设平西抗日根据地。任命赵同为支队司令员、高鹏为副司令员、汪之力任政治部主任、常戟武为参谋长、一总队队长纪亭榭、政治处主任陈大凡、二总队队长王建中、政治处主任杜伯华、三总队队长刘凤梧、政治处主任沈海清。各大队的大队长有王文、包乾、李望东、金震中、霍宝林、李育民、江声、王洁清、韩庄等，政治指导员有张如三、王达、于善甲、霍至德、史进前、曹裕民、黄秋萍、尚英、戴昊、那恕等。明确了司令员的命令须有政治部主任联署方能生效，中心队委改为总支，王远因任总支书记。当时，党的组织及党员虽还未公开，但从司令部到各总队以及各大队的领导权都处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司令员的赵同虽心怀叵测，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赵同的狼子野心未能在党的教育和挽救下而有丝毫的改变，最终他还是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三、赵同其人

赵同是国社党党员，是一个怀有狂妄政治野心并具有阴险毒辣性格的人。从东北入关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搞起了一个二十几人的武装，并在北京东安市场刻了“总司令印”的铜印，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久被国民党打垮后，还不死心，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拉起了一支有五、六十人的游击队，此时的赵同，不是积极地依靠党的领导，而是处处以部队为已有，大权独揽，随意行事，只因部队中的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作用，才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早在“七·七”事变前，赵同就把钻营的目标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在庐山他的谒蒋呈文中就称“赵同等向主张期望政府，不怀疑政府，辅助政府，不破坏政府”，向蒋表示忠心。这就不难看出，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缚在了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上了。“国民抗日军”成立后，赵同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择手段地火并其它抗日武装，当时的北平近郊有数股抗日的群众武装，其中原为冀东保安队的高宪章部有四、五百人，步枪全是新的捷克式，光机枪就有二十几挺。他们想和“国民抗日军”联合抗日，但是赵同盯上了高部的武器装备，于是，他设下鸿门宴，诱来高宪章给枪毙了，随后以高勾结日寇为名吞并了高部。这样一来，其它的抗日武装谁也不敢与他商谈合作之事了，“国民抗日军”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这次事件是赵同妄想独霸一方，唯我独尊，迫害异己的本性的一次大暴露。

赵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不但在部队中结党营私、任意妄为，而且还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利用亲属为自己假抗日真投机的行为涂脂抹粉。他经常的以阴谋手段揣测时机，阜平整训时，在讨论改编为八路军议案中，赵在举手赞同后突然提出辞去司令的职务要去八路军总部学习，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想试探一下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聂荣臻司令员知道此事后，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意义出发，亲自找赵同谈话，给了他许多鼓励，而赵同又假惺惺地说他赵同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并且还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的两面派嘴脸。赵同有个私人卫队，其成员大部分是他过去的亲信，平时跟着他寸步不离。赵的舅舅任福祥在任一总队长期间曾阴谋杀害纪亭榭及一些党的积极分子，将部队拉走，这其实也是赵同阴谋分裂队伍的一部分，幸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内乱。把任福祥及两个弟弟及儿子开除出了部队，消除了一个隐患。也使赵同更加孤立，阴谋更加难以实现，最后不得不只身挺而走险，跑到反动阵营中去了。

赵同的叛逃是革命部队中去掉了一个渣滓，他在部队时的行为始终是和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的，只不过是借抗日之机抬高自己的身价，作为本钱向上爬。他派往大后方的母亲和妹妹千方百计与蒋介石挂上钩，盗用平郊抗日游击队的名义与战绩，受到国民党的重视，还受到宋美龄的召见，被尊称为“游击队之母”。这个赵老太太从广州到香港、从重庆到南洋，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了无数国内外同胞，被宣扬成什么“军中之母”、“女中之师”、“中华民国的神后”。国民党利用这个人物来表示他们也在敌后抗战，完全成了国民党假抗战的御用宣传工具，而赵同也借以满足了一个人的政治野心和当作向上爬的绝好机缘。

赵同叛逃到他原在昌平前七村组织的独立大队，自称华北游击司令，就是这样，党还在挽救他，派去焦若愚、吴靖宇同志去争取他。但赵不但不思悔改，其反动面目更加全部暴露，毫不避讳地说出他曾有消灭各级领导人的计划，只是无人与他合伙，活动日趋困难，加上部

队有党的坚强领导，其阴谋才未得逞。

一九三八年底，赵同因无法活动，取道香港到重庆找国民党去了。一九三九年，赵受命带一批反动骨干潜回华北与八路军搞磨擦，破坏团结抗战事业，最后在石家庄附近被我军歼灭，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四、编入晋察冀军区第三团

国民抗日军作为一支抗日武装经聂司令员批准，部队开到军区内地阜平改编成晋察冀第五支队，负责建设平西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支队为准备回平西全力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区主要领导如：政治部主任舒同、参谋长唐延忠、军政学校校长孙毅都亲部队讲课。经过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支队本来应开回平西开展工作，只因赵同思想情绪一直不稳定，军区考虑到支队单独活动有一定困难，所以，军区命令五支队开赴灵寿，一面训练，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同时又扩充了几百名新战士入伍。各支部也相继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在部队中建立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支队政治部还出版了部队生活小报，整个部队充满了一片朝气。二月九日，支队根据军区的部署攻打行唐及正定附近各车站，这次战斗，对新入伍的战士是个很好的实战锻炼。

一九三八年三月，部队回驻阜平后接到军区要他们急速赶回平西宛平的命令。聂荣臻司令员在五台山接见了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指示五支队回平西后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开辟平西、支援冀东。

在回平西的路上，支队得到地方党组织送来的情报，有一支敌人运输队押送二十余辆马车的给养弹药从紫荆关运往涞源城，于四月三日九时左右过浮图峪。支队领导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消灭敌人、补充自己的机会，绝不能放过。通过和地方党商定，明确了联络暗号。然后，支队及各总队的领导到伏击地域观察了地形，仔细地作了整个伏击战的部署，一总队负责堵死敌人的退路；二总队担任正面捕歼任务；三总队从前向后打。经过三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十分旺盛，各总队按预定时间地点迅速占领阵地，战斗按时打响，进行的十分激烈，一直打到三日的中午，全歼日寇近百名，生俘两名，缴获全部枪支和物资。二总队在阵地上用两挺机枪击落了敌人的一架侦察机，打退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支队也伤亡五十余人。一总队的景庆云排长和王海龙班长，在战斗中勇敢地四个敌人拼刺刀，景、王二人都已受伤，但他们还是捅死两个、活捉了两个敌人，王因伤势过重，战后不久便牺牲了。支队参谋长常戟武和总队长纪亭榭也都负了伤。这次战斗在晋察冀初期战史中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全歼敌人的战斗，活捉敌人俘虏也是最早的一批，为支队赢得了勇敢善战的名声。第二天支队在涞源召开了军民联合祝捷大会，军区亦通令嘉奖，这时支队领导有较大变动，常戟武、纪亭榭到军区治疗，汪之力调二分区，陈大凡调孟阁臣部，军区任命王远因接替汪之力的职务，改政治部为处，总队为营、大队为连。王建中为一营营长兼教导员，韩庄任二营营长，阎铁任副教导员，沈海清为三营营长，史进前为教导员。四月下旬，五支队开回平西宛平，司令部驻在斋堂。

支队回到平西后，根据军区指示抽调一批主要干部充实、整顿地方政权和武装，王文、那恕、阎铁、贾嵩明等同志均被派去组织各县的县大队，有力地支援了地方政权的建设。五

月十二日。支队分别袭击了昌平城和石景山发电厂，使北平一连数日沉寂在一片黑暗之中，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五支队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对平西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形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不可战胜的巨大威势，对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正是有众多的像五支队这样的革命武装，才使我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更证明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理论的无比正确。

正当五支队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早就与我们党离心离德、貌合神离，怀有政治野心的支队司令员赵同叛逃了。在这种形势下，支队领导高鹏、纪亭榭、王远因等多次向军区要求合编。聂荣臻司令员经过认真考虑，立即给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发电，令其速带部队前往斋堂协助整编五支队，杨成武同志接电后立刻率分区二团一个营和特务营昼夜兼程北上，经紫荆关在“野三坡”中心镇——紫石口和五支队派来接应的王建中同志碰面，第二天清晨，杨成武部在王建中的带领下来到斋堂。经和高鹏等支队领导共同研究，按军区命令把五支队的战斗部队与一分区新编三团的三营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团，隶属一分区。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纪亭榭任三团团长、袁升平同志任政委、王建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高鹏调一分区任副司令员，王远因调一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从此国民抗日军——晋察冀军区五支队这支在党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抗日武装，经过近一年曲折战斗生活，经历了数次战斗的考验，克服和防止了本身内部投机分子的破坏分裂行为，顺利地编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作为一个主力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到处打击敌人。团的建制一直沿袭下来，直到今天，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五军一百九十三师的577团，为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继续奋斗着。



参加冀东暴动的一支农民组成的连队

李文举

“七·七”事变不久，安家庄村的李文彬拉起了一支抗日的群众队伍，下设两个中队，一个特务队，有二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宛平七区的人。这支农民队伍经过我党的工作，被编成平西游击第一总队，李文彬任总队长，八路军三十三大队副团长陈群同志兼任副总队长。一中队长魏国臣（青白口村人，一九三三年入党），指导员王云（雁翅村人）；二中队队长张玉亮（雁翅村人）；特务队长李文贤（安家庄村人）。这里，我着重反映的是魏国臣领导的一中队情况。

一九三八年二月，邓华同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独立师三团到达平西后，李文彬部接受了改编。其中，魏国臣同志领导的一中队被编为纵队司令部第二警卫连。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二警卫连随纵队挺进到冀东，一直打到山海关内的抚宁县后返回遵化铁厂。同年秋后，纵队奉命撤回平西，留下第二警卫连为主力组建了冀东游击第一支队，陈群任支队长，苏梅任政委，周文彬任政治部主任，人称苏陈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

这支由我区农民组成的队伍，随着主力在敌人前堵后追，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打到了冀东。一路上参加了不少战斗，完成了保卫司令部安全的任务。在铁厂参加了苏梅、陈群指挥的消灭蒋、朱、张等七个土匪司令（七伙土匪），粉碎了他们设置“鸿门宴”的阴谋缴了他们的枪，为冀东人民除了害。东进到抚宁县燕河营突围时，连队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最后撤出。吕怀玉（安家庄村人）、李文举（安家庄村人）俩人跟着连长魏国臣多次从泥土中爬起来。战斗中，皮匠的儿子、一班班长李国良（青白口村人）负了重伤。在挺进冀东的路上，连续几个星期的倾盆大雨，一部分人是光脚爬山涉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掉队，而且还完成了保护在沙峪战斗中负了重伤的纵队参谋长李钟奇的任务。

八路军主力撤回平西后不久，武汉失守，日本为了侵略全中国，保住山海关，从前线调回小林师团，在冀东由平原到山区进行残无人道的清剿扫荡。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抗战，留在冀东的部队化整为零到处打击敌人。在形势最为严酷的情况下，魏国臣奉命回平西向挺进军司令部汇报情况，而部队分散潜伏在群众之中，完全变成单线联系，形成一种白区地下斗争的形势。在组织的授意下，部队的同志以给人家当长工或当儿子等各种形式作掩护。有的同志被坏人告密光荣牺牲。如支队长的警卫员高学增（黄土台村人），在遵化铁厂××庄的老霍家隐蔽时，由于奸细的告密被日本鬼子包围了他的住所，敌人用尽各种手段摧残房东老人和孩子。一个个吊在房梁上，也没有承认有八路军住，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的热情。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把老人拉到院子里要用刺刀挑时，藏在房后山坡隐蔽处的高学增再也忍不住了，跳出来大喝一声：“住手！不要伤害老乡，我就是八路军。”日本汉奸把他带到铁厂关在警备队内。事情发生后，几个村的村长联名花钱给鬼子的翻译官往出保他，翻译官在受了贿并为小高的铮铮傲骨所影响，多次告知小高，只要你承认是便衣队的人，我

就能保你出去。但高学增执意不肯，斩钉截铁地说：“老子是正牌八路军。”当押其去东门外活埋路过铁厂大街时，他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街道两旁的男女老少切齿愤恨日本鬼子，赞颂小高的英雄傲骨，无不潸然泪下。当要活埋小高时，他对那个翻译官说：“你不是说你也是中国人吗？给我松松绳子，让我把坑再挖深些。翻译官和日本人低语几句，一个日本兵去给他松绳子，就在松绳子之际，他飞起一脚踢倒那个日本兵（小高在二十九军学过拳脚），另外一个日本兵连打了他三枪，小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倒下去了。他的英勇牺牲，给我们那时分散隐藏在老乡家的战士做出了榜样，在冀东人民心中也留下了美名。

这支农民组成的连队，从平西出发时有数百人，从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到冀东后陆续提升调出数十人，如原排长李兆奎（雁翅村人）升任连长；排长傅万奎（傅家台村人）调出任某队指导员；原班长李成华（安家庄村人）在解放北京牺牲时是四十军的一个团长；连长魏国臣同志提升为总队长，一九三九年春为执行挺进军司令部的指示，为撤回平西做准备，到丰润县筹集粮款任务时，牺牲在丰润县西佑国寺；在矛山战斗中牺牲了王永清（河南台村人）、高洪武（雁翅村人）等13位同志。一九四一年夏，当时的12团警卫连连长李兆奎、指导员吕怀玉等和团司令部在玉田县孟四庄和日本鬼子血战时，与陈群团长共同牺牲。这支由平西组成到冀东参加暴动，最后留在冀东坚持战斗的百多人的连队，为创建冀东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支农民组成的连队，竟能如此勇往直前，主要是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同时也是与魏国臣同志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这支队伍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农民，其中也有“煤黑子”、扛长工的、手工业者，还有个别的地富子女，属于进步青年。这个连队从成立中队起，就有由中队长魏国臣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不久即以魏国臣、王云、贾兰波等组建了党支部开展党的活动。魏国臣等经常给战士们讲团结抗日、讲八路军是工农劳苦人民的队伍，打完日本后我们要建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有书读的新中国，对战士们进行民族的、阶级的教育。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这个连队已有十多名共产党员，并有了一大批党的积极分子，这就是这个连队能团结奋斗，忘我牺牲的主要原因。如青白口村近五十岁的皮匠李正兴（管伙食）和他的儿子李国良（当班长）、李国新（当战士）父子三人都在连里，当部队要开往冀东之前，魏国臣找李正兴谈话说：“你们爷三个还是回去一个吧，不然家里怎么办啊？”老李毫不犹豫地笑着说：“打仗就要父子兵吗，留在家里也没有出路，还是为人民打天下吧。他们哥俩留不留由他们决定，我是不留。”最后爷三个谁也没留下，一起奔赴了抗日的战场。当部队打到冀东驻在丰润县潘家峪时，房东老大娘问战士们多大岁数了？是哪里人啊？出来妈妈不想你们吗？战士们回答：“我们都19岁左右，平西人，妈妈高兴我们为穷人当兵打天下！”

这支农民组成的连队，不断地经受着革命战争烽火的考验，并茁壮成长壮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冀东游击第一支队为基础组建了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团，在解放战争中，又以十二团为中坚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后四十军在整理军史的过程中，特聘请苏梅同志为名誉政治委员。解放后，冀东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修建了烈士陵园，陈群、魏国臣等烈士安息在那里，他们的英雄业绩，为后人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抗战前党在矿区活动概况

谭列飞

一、一战时期的星星之火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北京地区，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党的创立做准备。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王复生做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来到门头沟，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党成立以后，长辛店地区和京郊铁路线上大的车站都纷纷建立了党的组织，门头沟是平绥路的一条支线，承担着将门头沟所产之煤运往北京等地的任务，党在门头沟车站周围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3年，在全国规模的工农运动高潮影响下，京西矿区也掀起了为生存，为提高经济待遇的群众运动。1925年2月25日《益世报》曾报道：“二月，京西三家店，门头沟有新旧煤窑七十七处，每处多者六、七十人，少者三、四十人，工人每日工资1.70元，现在各煤窑因销路滞塞，裁减工人，并将工人工资减去三角，工人四、五百人集会，要求恢复原有工资。”

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北京门头沟的工人运动也有很大影响，促成了杨家坨煤矿的反帝风潮（本刊曾有介绍）。

192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门头沟煤矿活动起来，曾建立了党的“特支”。当时在党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1928年2月6日，河北省委根据1927年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在《目前的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北京开始的工作（要）派学生同志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会，特别是要立即派人前往门头沟工作”，并根据近来出现的一些工人群众中的自发斗争，提出：“党要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并煽动日常生活的斗争，最短期间内，鼓动产业工人的大罢工”。省委在三月份的工作计划内也强调：“速找线索在门头沟组织党的支部”。

1929年2月北平市委决定了工作计划，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明确提出，“对于门头沟（其他省略）等工作亦注意打入，建立组织。”“各支部尤其是工人支部应分配一部分同志担负职运工作”。不久，北京市委便派了特派员到门头沟矿区了解工人的生活 and 工人运动情况，为进一步开辟工作创造条件，制订策略。1930年5月，顺直省委给北平市委发出了指示信，又着重强调：“北京有重工业，门头沟矿有二万余人，你们要进一步的切实布置产业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作转变的实际基础，同时省委决定调唐山有职工运动经验的同志来北平指导工运”。“门头沟矿山的特派员不是简单的派去调查，必须同时开始他对矿工的工作。”指示信后，从唐山矿区派来一批同志到门头沟矿区开辟工运工作，发展了李庆华、宋兆祥等矿

工加入党的组织。同时，上级党组织还派来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其中很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在矿区从事工运工作，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门头沟矿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二、党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革命理论

一大批党的干部进入煤矿以后，利用矿工流动性大，不固定的特点，住进了工人居住的锅伙，在矿区站住了脚。以后，又深入到矿井，把宣传革命思想和提高工人的觉悟做为工作的第一步。党组织创办了油印小报，不定期的出刊，发到井下、锅伙中，撒在工人上下班的路路上。小报的名称多种多样，有《小工报》、《窑黑报》、《矿工报》等，分别用各色纸印，每一期小报登载一个主题。1933年为配合罢工斗争印了《紧要新闻》写道：“做工的兄弟们呀！咱们应当齐努力，大家联合起来，一致向厂方要求下面五件事：（一）轧、砸死的开大支，要三百块；（二）受伤的要照数开支，残废的开大支；（三）借钱柜头不要利；（四）井上井下全要八小时，井上改小班；（五）井下要安置稳柱头，不许强迫工人到险地。”

这些宣传使矿工们平生第一次在思想上受到震撼，知道了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救星，在矿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三、党团工会组织的建立

1929年党在门头沟煤矿的矿工中建立了七、八个工人的关系，开始着手建立党的组织，1930年以后，党在门头沟煤矿又建起了党支部，1932年5月以前，党的负责人是“门头柳”，绥远人，真实姓名不得而知了，这年5月，党派他到绥远搞兵运工作，接替他来门头沟工作的负责人是李葆华同志，支部委员郭新梅，时间不长调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工作，被敌人杀害了。支委还有柏玉生、老王（山西人）、小赵（河南人）、老赵（唐山人），他通过亲戚（“中英矿”的高级职员）关系，也在矿上当上了职员。

1932年8月，李葆华同志调到冀东开辟工作，由老赵接替了他的工作，后来党在门头沟的负责人有赵春霄、李江、李堂春等。

1932年以后，门头沟矿区内的党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党在有一定基础后制订了工作大纲，主要内容：“1. 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今后的工作布置；2. 在各工厂、各部门，尤其是各中心部门、各大窑、各机器部门、非工部门、小窑上背拉工人（当然不是放弃里工们）中尽量地推动进行发展组织（兄弟团），建立赤色工会与党的组织，抓紧工人的日常斗争，如外工反对包工柜对工人支钱扣利，小窑工人要求背多少煤领多少钱，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到月头不开支等斗争，尤需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加强附属组织的作用，建立赤色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会、青年团和党的外围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有70多名矿工靠近党的组织，要求入党。党为了发动矿工，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很多学生党员，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工人们一同背煤，吃住在一起，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有很多人身体弱多病，多年从事学运工作，干一天活连自己也养不了，但仍然坚持工作。1934年11月份当时一位同志写的报告中反映：“在淹窑期间，同志们连小米粥都喝不上，两顿饭光喝水是经常的事，在这种经济困难中，我们又买油墨让“青年小报”继续出刊，并在斗争中建立了工会组织、团组织。”团组织从最初的七人，发展到八十六人，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门头

沟中英矿的矿工。这八十六人中，建立了小窑和治水公司两个支部，中英矿中建立里工团小组。党的外围组织有读书班，读报班，俱乐部等，党员、团员为进一步联系群众，发展党员，以拜把子、建立兄弟团等方式，建立了很多组织和联系人，为党的活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这期间，一些卓越的革命战士都曾在门头沟从事地下斗争，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卓越将领李兆麟当时化名李烈生曾在门头沟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1933年夏，刘宁一同志来到门头沟，他后来回忆起，觉得当时“门头沟有一定的党的工作基础。”

四、党领导的工人斗争

1. 争取洗热水澡的斗争

1933年2、3月间，党领导了为争取工人洗热水澡的斗争，当时中英门头沟煤矿想方设法剥削工人，每个工人上一个班，包工柜要扣一分钱的洗澡费，但是在这期间却没有开米为工人洗澡的热水，使工人们非常气愤。党组织决定以此事为契机，在工人群众中进一步树立党的威信，以便更多地团结广大工人群众。

3月5日，“中英矿”党支部召开了支委会，提出“①、反对给工人洗冷水澡，包围矿务局要解决热水洗澡的问题；②、取消包工柜扣一分钱的洗澡费”。工作从这天开始，青年团的同志们在锅伙里、井下、上下班路上，加紧进行宣传，还召开了“锅伙会”、“窑底下会”、“路边会”，组织了由党团员、工人骨干参加的“组织斗争委员会”，还印制了《为反对矿务局给冷水洗澡告中英矿工友书（青工书）》的传单三、四种，以洗热水澡为中心，把宣传品发到工人手里，工人们争相传阅，一些不识字的工人也拿回来让别人念给自己听，团组织还组织了粉笔队，在中英矿局围写了很多标语，这些工作使广大工人群众奔走相告，“这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是为工人干好事的。”中英矿的资本家和包工柜感到很恐慌。从第三天起，中英矿便开始让工人洗热水澡了。通过这次斗争，使矿上的资本家看到了工人群众的巨大力量，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使工人群众认识了党，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2. 争取增加抚恤金的斗争

煤矿恶劣的工作条件，资本家残酷地压榨工人，不仅使工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生命毫无保障，随时都有因矿井事故夺去生命的危险。然而，死一个矿工，资本家对有家眷在附近的给一点抚恤金，若无家眷连一点抚恤金都没有，党决定为争取增加工人抚恤金而斗争。

1933年元月初，治水公司砸死了三名工人，仅给家属66元钱，就算了事了。治水公司的党组织了解到以后，一方面动员家属提出增加抚恤金的要求，一方面又广泛发动工友，造成不增加抚恤金就罢工的声势，派代表向矿方提要求，又利用包工柜向矿方施加压力，经过斗争，最后，矿方不得不增加了抚恤金，每个矿工加发了三百元，这给其他煤矿震动很大。

仅从1933年2月10日统计，五十天来，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组织了年关斗争，布置了以“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一角”；“反对借钱扣利”为中心的年关斗争，领导了里工“要求领煤”、“反对拨班”、“要求抚恤被砸伤的工人”、“反对捆绑工人”与“小工怠工”的斗争，除了里工斗争外，其余都获得了胜利。斗争中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召集了大小三十余次群众会议，包括四、五百群众以上，召集了三个柜头与里工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

里工斗争委员会。

3. 投身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踏进了东北，进而把战火烧到华北，1932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日宣战通电》，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门头沟矿区内的党组织积极发动广大矿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7月，门头沟党组织散发了《纪念八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告门头沟劳苦群众书》，号召工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的不断投降，并在工人中组织“工人反日会”，工人們的抗日情绪高涨起来。一些当过兵的矿工纷纷表示“我们应当为国家出力，我们以后还得去当兵，不打倒日本鬼子是不成。”有两个在方振武第二师当过兵的矿工说：“共产党打日本我们很赞成，我们将来要投红军去。”同时很多当地的矿工愤恨国民党对农民大量搜刮苛捐杂税，只扩大内战，而不打日本侵略者。

1933年5月，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的奔走下，联络国民党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组织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宣布对日作战，门头沟矿区党组织号召矿工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抗日前线中去。6月，中英矿的共产党员赵景玉带领着一批矿工（其中主要是党员、团员和我党的积极分子）到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赵景玉还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副团长。7月，共产党员宋兆祥又带领一批工人到张家口加入到同盟军的行列，成为军中的骨干，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显示了“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

4. “左”倾路线在门头沟矿区的影响

30年代初，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又在我们党内占了主导地位。给我们党的工作和斗争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在白区，王明路线给我党带来的危害更大。门头沟矿区从30年代初，党逐步在这里建立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然而，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门头沟这个拥有近万名产业工人，又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终未得到应有的发展。1932年11日《门头沟特支工作情形报告》就提到：“在工作上执行群众的公开路线。”“公开宣传，公开组织群众，打破了宣传上的秘密方式，打破了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并且提出了很多与工人切身利益甚远的口号，如：“武装保卫苏联”等，在组织上不注意积极慎重地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而要工人参加“红军之友会”，“苏联之友会”。一味强调公开，凡是节日都要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又组织和动员工人组织所谓苏区旅行团，要他们到江西苏区去参观学习。当蒋介石大举进行五次反围剿时，要工人们去参加红军，并出钱资助红军。一味强调轰轰烈烈，不仅把门头沟矿区内党的同志暴露给敌人，还促使一部分进步的工人公开地与敌人斗争，与党的同志接近，公开组织赤色工会。当时门头沟支部书记李葆华同志曾回忆说：“当时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下一遇到节日都要开展群众运动，在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和‘国际反战日’，我们在河南街最热闹的地方召开过两次群众大会，有500人拥挤在街道上听讲。工头知道了出面干涉，双方就互相打一阵子。”在白色恐怖下，有大批共产党员被敌人通缉、逮捕，党很难在这里扎下根，一些意志薄弱者成为叛徒，党的组织遭到多次破坏。到1934年党的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以后党的活动是在抗战时期开始进行的。